



井冈山道路的远播与影响

□ 孙 伟

90年前，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相关的另四块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湘鄂赣、湘赣、闽浙赣都直接受到了井冈山的影响，稍远一些的湘鄂西、鄂豫皖、东江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井冈山的斗争经验。

井冈山道路是超越时空的，由于自身的革命功绩，中共中央的极力推广，以及国民党的负面宣传“帮忙”等，它的经验传遍了中国的天南海北，一直影响到新中国的成立；甚至远播国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二战后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影响

陕甘边区党组织原本并未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启示和鼓舞之下，也加快了自身武装割据的步伐。

1931年初，陕甘边区党组织在收到中央翻印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等文件后，对如何开展武装斗争有了新的认识。刘志丹曾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自此，陕甘边区开始改变过去单纯进行兵运工作、单纯开展武装斗争的倾向，决定向井冈山学习，今后要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斗争，开辟巩固阵地。到1932年上半年，在上级党组织的帮助下，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辽阔的西北大地树起了一面鲜艳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

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影响

广西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在邓小

平、张云逸等人的领导下创建的。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通过湖南、江西等省委汇报的情况以及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初步掌握了井冈山的情况，比较熟悉朱毛红军的做法。他后来说：“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

1929年7、8月间，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前往左右江地区领导革命斗争时，也带去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创造的新鲜经验。同时，根据红七军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运用和发展。比如，在百色起义胜利后不久，邓小平等就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还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土地分配等方面的好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红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1930年3月2日，党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赞扬了红七军的这一做法：“你们的编制，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因此，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也扬起了井冈山斗争经验熠熠生辉的旗帜。

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游击战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在长达14年之久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通过地下交通线的努力，一些记载着朱毛红军历史和经验的小册子相继传入东北，为东北抗联学习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游击战争经验提供了依据。

东北抗联的主要领导人杨松，曾经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因而对朱毛的斗争经验比较了解。杨松一直强调要以井冈山道路作为东北抗联开展对日斗争的指导原则。1938年4月，他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文章指出，“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曾参考过去朱毛在江西井冈山时期内和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内的游击战争之经验”。1938年5月1日再次提到，在军事上常常运用朱毛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诀去对付敌人的

“讨伐”。这样，在远离党中央及长期与中央中断联系的东北，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斗争、群众工作等许多宝贵经验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国外的影响

朱毛领导的红军通过中共中央的汇报，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1929年1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援助朱毛问题”，作出了三项决定：“（1）以中共中央名义派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同志到朱毛地区去。（2）讨论信件时，要从总的形势和今后运动发展前景出发，弄清在继续开展朱毛运动是否适宜问题上的方针。（3）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

共产国际除了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宣传和介绍井冈山道路外，还把朱毛的斗争经验引入了课堂。比如，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屈武回忆，1929年4月初的一天，全班同学集体学习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与屈武同时参加学习的刘伯承回忆：“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中国革命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得见了。我和屈武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同志并肩战斗！”

长征结束后，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来到陕北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回去后写了《西行漫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等，详细介绍了朱毛在井冈山的斗争经历，这些著作都成为井冈山道路在全世界传播的重要载体。

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还对亚非拉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一行时指出：“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问题。”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始于井冈山。20世纪60、70年代，曾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纷纷来到井冈山，虔诚地学习毛泽东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

以史为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开展纪律建设的实践。1927年召开的党的五大通过总结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多项开创性措施，推动了纪律建设的深入发展。全面梳理和深入挖掘这些发展，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次提出“政治纪律”概念并置于突出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政治纪律是党保持团结统一，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基本保证。党早在创建时期就在党纲或党章中规定了多项有关政治纪律的内容。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这就首次提出了“政治纪律”概念，并将其放在了纪律中的突出位置。党的五大能够提出“政治纪律”概念，主要得益于两个条件：一是共产国际对大会的全程筹备、组织和具体指导，为大会提出“政治纪律”概念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二是党成立后开展的维护和执行政治纪律的实践，为“政治纪律”概念的提出创造了必要的实践基础。除了明确提出概念外，党的五大党章纪律一章的六条内容中，有五条直接涉及政治纪律，进一步凸显了政治纪律的重要性。比如，前三条强调了要执行党部机关的决议、对不执行上级机关决议的纪律处罚、决议形成的基本原则及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决议提出抗议的程序，这些都属于政治纪律的重要内容。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以强化政治纪律为主要内容的纪律建设，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放在治党工作的第一位”，将其作为“应对各种政治考验和复杂环境能力的重要手段”，使党始终保持了内部的团结统一、政治上的坚定有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首次规定设立党内专门执纪监督机构

党的五大之前，尚未正式设立专门的执纪监督机构，党内执纪监督的权力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党在20世纪20年代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省港工人大罢工中，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于1925年2月至6月间成立的第一个地方执纪监督机构——中共广东区委

监察委员会，为以后在党内正式设立监察委员会提供了直接经验。

党的五大通过总结上述实践经验，并借鉴苏联共产党设立监察委员会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在党章中正式规定设立中央和省级监察委员会，并在多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一是在人员组成方面规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这就明确将监察委员与同级党委委员分设，保障了监察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二是在职权范围方面规定：监察委员有权参加同级党委会议及其他各种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这就赋予了监察委员参会的权力，使其能够对中央和省委的决策过程进行直接监督，从而有效履行监督职能。三是在决议的生效和实施上规定：党委不得取消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但其必须征得同级党委同意才能生效与执行。这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同级党委，削弱了其独立性。然而，该规定又强调监察委员会决议一经形成，便不得被同级党委取消，也赋予了监察机构决议相当的权威性。此外，党的五大还选举产生了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党从此有了正式的中央执纪监督机构。然而，此后随着政治局势的恶化，党被迫转入地下，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一年后的党的六大上被取消。虽然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仅存在一年时间，但它正式揭开了党内设立专门执纪监督机构的序幕。

完善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纪处罚方式的规定

对违纪行为处罚方式的规定是党的纪律的重要内容，它反映了党的纪律规范化水平和完善程度。早在党的二大上，党就对违纪行为的处罚方式作出过明确规定。当时全国仅有195名党员，又多为知识分子，对党的指导思想、纲领和纪律理解和认可程度较高，维护和执行纪律相对简单。因此，党的二大党章对违纪行为处罚方式的规定较为简单而严格，即对党组织规定为取消或改组，对党员则规定为留党察看、开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员的人数不断增长，至党的五大时已猛增至57967人。党员队伍的迅猛发展，使得党员的活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同时由于党内教育未及时跟上，也导致党员的质量不高和纪律意识淡

党的五大如何推进纪律建设

□ 徐丙祥

薄等问题更加突出。在这一情况下，就需要对以往简单又严格的违纪处罚方式进行调整，既不影响党员数量的增长，又严明党的纪律。因此，党的五大对违纪处罚方式的规定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完善，其中对党组织违纪处罚方式修改为“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同以往相比，处罚方式更加合理和规范。而对党员违纪处罚方式增加为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方式。这就改变了以往对党员违纪行为处罚方式单一且程度偏重的情况，较好地适应了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的新形势，同时能够对党员形成有效约束。这一规定的内容也成为以后历部党章对违纪行为处罚方式规定的参考蓝本。

（上接1版）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个量变的过程、积累的过程。因此，不能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就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另外，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也不能以经济一个方面的因素去看，而是要从社会各方面的因素综合去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发展阶段必须判断准确，既不能超越，也不能落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一次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搞了“大跃进”，最终欲速则不达，越想就越快不了，受到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汲取历史教训，作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这里所指的长期到底长到什么时候呢？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讲的是100年。他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100年不动摇。100年，这一方面表达的是一种决心、一种意志，另一方面表达的也是一个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一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大概是100年。党的十九大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比以前规划的目标提前了15年。到2050年或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世界角度看，我国虽然“块头大”，但“虚胖”，在产品质、生产效率、经济结构等方面还含有一定的“水分”。我国虽然大，但大而不强，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对此，我们也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在认识和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时，只有抓住了上述“两个充分认识”，把握住“变”与

“不变”的辩证法和统一性，才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四个伟大”的相互关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这“四个伟大”是有着严密逻辑关系的。

“四个伟大”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总方略、总框架、总坐标、总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四个伟大”，是按照实现伟大梦想这一条主线，也就是按照我们党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的历史使命分别展开论述的。“四个伟大”既有各自的内涵，其内在关系又是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必须强调的是，“四个伟大”并非平行的关系。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建设伟大工程，它起着决定性作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长期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历史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伟大斗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能不能取得成功、推进得好不好，关键在中国共产党；伟大梦想能不能实现，也在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凝聚起磅礴力量。同时，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不要空谈，不能脱离实际。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

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内在关系

党的十九大要求全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并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我们要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是完全一致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理论上进行的高度概括和凝练，主要内容体现在“8个明确”，它是指导思想层面的表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是在实践层面、方略层面的展开，主要表述为“14个坚持”，它是行动纲领层面的表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是一个有机联系、相互契合的完整理论体系，必须贯通起来把握。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分割开来，机械地、呆板地、僵化地理解。当然，思想理论和战略部署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入学习，加深领会，但必须始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来对待、作为整体的一个系统来统筹、来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一致性，不能将“8个明确”和“14个坚持”生搬硬套地一一对应，要

抓住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联系，基本方略本身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步走”战略安排的表述

党的十九大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未来的30年，分两个阶段作出战略安排，也可称为“两步走”战略安排。现在，有人将党的十九大“两步走”战略安排表述为“又一个‘新三步走’战略”。这种表述，我认为应该慎重使用，否则容易产生误解和歧义。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同“小康”这一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的话语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两步走”战略：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十三大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主要是对第三步战略作出具体安排。即21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九大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作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把原来“三步走”战略的最后目标提前了15年。第二步，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奋斗目标将党的十七大党章中的基本路线表述的奋斗目标增加了两个字、修改了两个字。增加了“美丽”，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态文明建设。由此构成了“富强”对应经济建设、“民主”对应政治建设、“文明”对应文化建设、“和谐”对应社会建设、“美丽”对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完整格局，并根据目标任务的变化，将“国家”修改为“强国”。

为什么有人说是“又一个‘新三步走’战略”呢？他们主要是将党的十九大到2020年仍然作为一步。虽然这个时间段有一个目标任务，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建设已经作了安排部署，我认为不应该作为单独的一步，还是应该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表述称之为“两步走”战略或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为好。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奋斗目标的接续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

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个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构成完整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思想逐步发展成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

有人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管长远的，是短期的、阶段性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依据就是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就实现了。所以，这个战略布局到2020年也就完成使命了，也就完结了。党的十九大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在学习时给予关注。事实表明，这个战略布局是管长远的。在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是始终有效的、管用的。

我们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全面的眼光观察问题，要在一般意义上、原则意义上、普遍意义上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不要局限于具体内容的表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我们大目标下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已经提出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认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后，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或强国）所替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依然是一个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的完整体系，依然是管长远、管根本的，至少要管到本世纪中叶即2049年或2050年。